

楊一清的政治生涯： 嘉靖初年在野正德舊臣與「大禮議」關係的探索*

趙現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導語：史料、研究現狀與本文的問題及角度

楊一清(1454–1530)是明中後期名臣，出將入相，功績卓著，詩文書法皆有成就，留下了豐富的著述。《明史·藝文志》記其著述凡三種：「《楊一清奏議》三十卷、《石淙類稿》四十五卷、詩二十卷。」¹這其實是史館就其著述內容所加分類，並非書名如此。一清奏議在其生前多數已刊刻，並未有《楊一清奏議》之名目。2001年，唐景紳、謝玉傑將這些奏議彙編成《楊一清集》出版。一清詩作多數於嘉靖年間(1522–1566)由門生李夢陽、康海彙編為《石淙詩稿》，依一清宦涯之不同階段，凡分二十卷。²「詩二十卷」所指應即這部份內容。清嘉慶年間(1796–1820)，雲南巡撫孫玉庭等又根據《石淙詩稿》的傳鈔本，增收部份詩作，改名《石淙詩鈔》。³至於「《石淙類稿》四十五卷」則已散佚，《明滇南五名臣遺集》中所收《安甯楊文襄公集》僅收錄了部份內容。《遺集》凡四冊，由李根源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鈔輯而成。《安甯楊文襄公集》居首，且佔三冊，凡文三十八首、詩五百零六首，書後附錄詩文十三首。多數詩作見於《石淙詩稿》、《石淙詩鈔》，但書柬為《安甯楊文襄公集》所獨有。⁴這部份書柬、詩作，尤其是書柬，直接體現了楊一清的內心情懷與人際網絡，彌足珍貴。

* 本文2002年寫成初稿，2008年完成改訂。根據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又作了相應的修改，謹致謝忱。

¹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九〈藝文志四〉，頁2471。

² 本文所用《石淙詩稿》版本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³ 本文所用《石淙詩鈔》版本是《叢書集成續編》影印《雲南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

⁴ 參見楊一清：《安甯楊文襄公集》，收入李根源(鈔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宣統三年(1911)七月吳琨刻本，藏國家圖書館。

學界對於楊一清的專題研究，從上世紀三十年代便已開始。近年之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楊一清的生平介紹、馬政邊功與文學書法三方面。這些文章所探討的問題與本文並無直接關涉，在此不一一介紹。對楊一清政治生涯進行全面探討的論著最初甚少，近年卻儼然成為一個熱點，而且除方樹梅編纂的《楊一清年譜》與譚祖安、戴美政著的《楊一清評傳》外，其他皆為碩士論文。《楊一清年譜》系統記錄了楊一清的生平，⁵《楊一清評傳》則是目前唯一一部專題論述楊一清的著作，對楊一清家世、出生地，以及與安寧關係的論述，頗多新見。書後所附地方文獻與傳說，對於未來楊一清的深入研究具有參考價值。⁶研究楊一清政治生涯的碩士論文有四篇：郭淑吟〈楊一清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82年）共分七章，其中第六章「秉政時期之政局」分析了楊一清在嘉靖初年內閣任上之政治措施，與議禮新貴政治觀念之差異，及最後遭到奪職。這與本文「楊一清與嘉靖初年明朝政局」一節所關注的問題相同，但思路卻有差異。魏登雲〈楊一清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全文共分五章，扼要評述了楊一清在明中期的政治影響，指出張璁承認楊一清有支持《大禮或問》與鼓勵席書赴京等事。袁希名〈楊一清與明代中期政治〉（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探討了楊一清與明中期政治的關係。胡克誠〈楊一清與嘉靖新政〉（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論述了楊一清與嘉靖新政的關係，指出楊一清最終去職是由於方獻夫的密疏攻擊。

綜合以上成果來看，近年對楊一清政治生涯的研究有所加強，但多數仍限於對基本史實的梳理階段，缺乏圍繞某一問題的深入研究。以楊一清與「大禮議」的關係而論，目前基本停留於楊一清曾致函席書及其復出後處理議禮失敗諸臣的問題上，並未詳細探討楊一清在野議禮的整個過程和特點、如此做法的政治背景，以及嘉靖初年政局的特點，楊一清立場與議禮新貴的根本相異處，及其與楊一清最終失敗的關係。在史料運用上，以往研究對《楊一清集》、《石淙詩稿》的利用不夠，更未利用《安甯楊文襄公集》，實際上對楊一清的政治心理與人際網絡並未展開分析。

「大禮議」是對明後期政局影響深遠的一次政治事件。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1505–1521在位）暴斃，因無子嗣，朝廷依照《皇明祖訓》，由武宗堂弟、興獻王（朱佑杭，？–1519）世子朱厚聰（明世宗，1521–1566在位）繼承皇位，改元嘉靖，廟號世宗。世宗即位後，圍繞「繼統」、「繼嗣」問題與廷臣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禮儀之爭，最終以建立了獨立的皇統世系與清洗楊廷和（1460–1529）一派正德（1506–

⁵ 方樹梅：〈楊一清年譜〉（上、中、下），《雲南文史叢刊》1990年第2期，頁97–114；1990年第4期，頁101–9；1991年第1期，頁100–115。

⁶ 張毅（策劃、審稿）、譚祖安、戴美政（著）：《楊一清評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21) 舊臣而告結束，這一事件史稱「大禮議」。「大禮議」深刻影響了明後期政局的走向，受到了後世學者的廣泛關注。⁷

以往研究基本描繪了一幅正德舊臣同仇敵愾應對世宗的景象，但這是建立在對在朝官員的分析基礎之上，鄧志峰、胡吉勛對於王陽明(1472–1529)與王瓊(1459–1532)的研究，已為我們揭示了在野、在朝正德舊臣在議禮立場上的分歧。⁸二人反對楊廷和的原因皆是正德朝的舊時恩怨與嘉靖新朝的不被起用。

關於在朝、在野正德舊臣議禮的分歧及其根源，尚有深入討論的餘地。由於資望、性格、政治取向與人事關係的不同，在野正德舊臣在「大禮議」上所持的立場也有所不同。有支持楊廷和者，如林俊(1452–1527)；有不參與者，如正德初年致仕的劉健(1423–1526)、謝遷(1449–1531)。劉、謝二人作為前朝舊輔，對「大禮議」也應有自己的看法，雖並未直接表述出來，但劉健斥責楊一清復出，謝遷卻再獲起用的不同舉動背後隱約折射出劉健傾向楊廷和一派，謝遷對世宗不持反對態度的政治立場。二人由於長期脫離朝政，與在朝正德舊臣少有瓜葛，故不願再趟此渾水，亦未參與議禮。在野正德舊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幾乎舉朝一致支持楊廷和的輿論下，反對楊廷和的人物。這些官員除了二王，還包括楊一清。

從某些層面來講，與二王相比，楊一清與「大禮議」的關係可能更值得關注。首先，楊一清與「大禮議」的關係比二王更為直接，恐怕影響也更大。王陽明只是致書門生，隱約地表達贊同的立場；王瓊由於待罪在身，更是只托人將書籍散播京師，自己卻始終未曾露面。楊一清直接致書在朝官員，加之楊一清當時的資望與地位，皆高於二王，影響也會更大一些，對於世宗「大禮議」中的獲勝，恐怕具有更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二王復出之後，並未直接參與「大禮議」的最後定論事宜，而楊一清卻以內閣首輔身份，主持了這一工作，完整展現了在野正德舊臣對於「大禮議」的態度。在這一過程中，楊一清所秉持的維護正德舊臣、防止官僚集團分裂的政治立場，與世宗及議禮新貴大相迥異，與其在野時發表反對楊廷和言論的主旨是一致的，這反映出在野正德舊臣對於「大禮議」的認識，相對於在朝議禮雙方，更為清醒與高遠，已超出具體的議禮範疇，著眼於政權的穩定。這是嘉靖初年一種值得注意的政治認識。雖然王陽明也大體持同一觀點，但並未直接表述與實踐過。

⁷ 關於「大禮議」的研究，參見胡吉勛：《「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緒論〉，頁1–30。

⁸ 鄧志峰：〈「誰與青天掃舊塵」——「大禮議」思想背景新探〉，《學術月刊》1997年第7期，頁97–103；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29–32；胡吉勛：〈《雙溪雜記》與明嘉靖初年朝政爭議關係研究：「蜀黨」、「封疆之獄」及王瓊復出背景之探討〉，《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6期(2006年)，頁199–234。

第三，議禮新貴在「大禮議」中支持世宗，主要是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這應是沒有多大疑問的。在野正德舊臣支持世宗，也大體可以納入到這一框架下進行分析，即由於在朝控制朝政的正德舊臣不起用在野官員，在野官員為爭取回朝機會，只能站在世宗的一邊。問題是為何這些官員未得到楊廷和的起用。本文認為楊一清之所以未能在嘉靖初年復出，在於首輔楊廷和的反對。楊廷和與楊一清的矛盾源自二人在正德朝分屬「東宮舊僚集團」與「交結豹房羣體的士大夫集團」，分別為「文學侍臣」與「事功能臣」，而其他在野正德舊臣反對楊廷和者，如王陽明、王瓊，亦屬後者。他們之所以在嘉靖初年不獲起用，進而反對楊廷和，根源皆在於此。也即是說，正德朝官員的仕路分途對於嘉靖初年的「大禮議」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而這一點是以往「大禮議」研究並不曾揭示的。

第四，本文借助對正德朝官僚集團東宮舊僚、文學侍臣與交結豹房羣體的士大夫集團、事功能臣的仕路分途的分析，不僅解釋了嘉靖初年在朝正德舊臣幾乎空前一致地站在楊廷和一邊的人事關係根源，而且這一分析框架對於明代，尤其明中後期政治的諸多現象的探討，也有助益。

最後，以往研究側重於探討議禮雙方勢同水火及由此而引發的政治清洗，而通過楊一清的個案可以看出，嘉靖初年存在另外一股清醒的政治意識。這一意識努力調節雙方的矛盾，避免政治清洗的發展，也即是說，歷史存在另外一種可能。隨著楊一清的失敗，朝廷中再無維護大局的主政者，嘉靖政局遂陷入官僚集團分裂、政治風氣狠戾的狀況，開明後期黨爭之漸。

正嘉之際楊一清的「心懷廟堂」與不獲起用

楊一清，字應寧，號邃庵，又號石淙，祖籍雲南安寧（今安寧）。生於廣東化州（今化州），隨父遷居湖廣巴陵（今湖南岳陽），後葬父南直隸丹徒（今江蘇鎮江丹徒縣），便家居於此。楊一清年少聰慧。「少而穎敏，能屬文。有司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之，與李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十四鄉試高等，即以經術為人師，十八成進士」。⁹仕途顯赫，在正德朝先後任陝西三邊總制、戶部尚書、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由於久歷仕途的關係，楊一清精明能幹，負有威望。「一清於時政最稱為通練，而性闊大，不甚飾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¹⁰在政治立場上有些靈活。正德年間，受武宗寵倖的「豹房羣體」權勢甚大，楊一清借助交結其中的重要人物宦官張永（1465–1529）與「佞倖」錢

⁹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一〈楊一清傳〉，頁433。

¹⁰ 同上注，頁435。

寧(?-1521)，得以入閣。總之，在楊一清身上，能夠看到明中期諸多追求事功的「能臣」秉持靈活的政治立場而取得成功的影子。同時，楊一清身上仍然保留了一些士大夫的風骨。正德十一年(1516)，楊一清由於得罪錢寧，被勒令致仕。回到家鄉時，楊一清賦詩一首，表白了此時的心境，其中有云：「平生性倔強，與世違低昂；揶揄豈足異，真樂吾未央。」¹¹

楊一清致仕回籍之後，並未遠離政事。「一清歸，其客日益進。當時目一清為智囊，所摹畫朝事與自全策踰度無爽，臺司郡邑造問無虛月，而一清之居間屬請亦如之，然不必盡私」。¹²對於甚囂塵上的寧王朱宸濠(1478-1521)欲反之事，楊一清也充滿擔憂。¹³當朱宸濠發動叛亂後，楊一清與平叛之王陽明、伍文定皆有書信往來，激勵二人，¹⁴自己也沉穩佈置鎮江防守事宜。

宸濠之變，公度鎮江扼江南諸鎮之吭，曰：「有備可禦三吳，失茲要害，吳越潰莫支矣。」於是捐資募諸壯士，復遣促臺使者調金山、鎮海諸衛軍，環備內外，無慮數十萬。武宗南征，聞其備禦有策，特幸公第為宴樂者逾兩日。¹⁵

儘管王陽明很快平滅叛亂，楊一清無從施展，但當武宗及其隨從豹房羣體駕臨楊一清宅園時，楊一清極盡表現。諸多記載皆稱楊一清目的是勸武宗勿幸浙江，但是否如此尚難確定。¹⁶無論如何，楊一清極力討好武宗與豹房羣體是無可置疑的。「一清大獻其金寶，所從巨璫幸貴咸飫」。¹⁷武宗甚至打算起用楊一清。「上幾欲特用之，會晏駕乃止」。¹⁸

楊一清雖懷用世之心，但在嘉靖初年楊廷和主持朝政、起用舊臣時，卻一直未被起用。「世宗即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賚存問」。¹⁹

¹¹ 《安甯楊文襄公集·詩集·歸至京口舟中感興二首》。

¹²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一清傳〉，頁435-36。

¹³ 雲南安寧流傳的「楊一清寫『九曲龍舞』」傳說，講述了楊一清擔憂「二龍共存」的故事。參見張國李(講述)、劉婷鳳、張平原(采錄)：〈楊一清寫「九曲龍舞」〉，原載《昆明人物傳說》，轉引自《楊一清評傳》附錄，頁276-77。這一故事反映了在民間傳說裏，楊一清對寧王叛亂是有預見的。

¹⁴ 《石淙詩稿》，卷一四〈得王陽明詩依韻寄答〉、〈用王陽明韻寄伍時泰廉憲〉，頁523。

¹⁵ 雷躍龍：〈石淙楊文襄公傳〉，載楊一清：《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附錄二，頁1121-22。

¹⁶ 黃景昉：《國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五〈正德〉，頁143。

¹⁷ 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再版)，卷一五，頁528。

¹⁸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一清傳〉，頁436。

¹⁹ 《國朝獻徵錄》，卷一五〈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楊公一清行狀〉，頁522。

「世宗嗣大位，羣臣爭上言一清可大用，至有比之姚崇者。乃詔遣官錫金幣存問，且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²⁰在這些薦章中，尤以胡世寧(1469–1530)對楊一清的評價最高。同樣居於鄉野的林俊卻由於在「大禮議」之事上公開站在楊廷和一邊而被起用。

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廷和寓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為工部尚書。俊力辭，不聽。²¹

若論資歷、威望與事功，林俊是比不上楊一清的。那麼，是否世宗反對起用楊一清呢？不然。「《弇州別記》云：『先是，上為世子日，獻王從容言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乎？」問為誰。曰：「故大司馬大夏、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以識之矣。』」²²既然世宗自幼便聽說楊一清的名聲，沒有得到薦章仍然固執不肯召其回朝的道理。況且世宗在嘉靖初年朝廷中十分孤立，十分希望有官員能夠支持自己，沒有道理不願起用與自己同居湖廣的同鄉名臣的。

明代吏部尚書獨掌文官任免之權，在起用舊臣中握有重要的權力。是否當時吏部反對起用楊一清呢？也不然。當時吏部尚書喬宇(1457–1524)為楊一清弟子。「宇幼從父京師，學於楊一清」。²³「君年十五謁門牆，我之年纔二紀強」。²⁴喬宇與楊一清感情相當深厚，時常書信往還、詩文唱和，這在《石淙詩稿》、《石淙詩鈔》、《安甯楊文襄公集》中記載甚多。正德年間，楊一清曾稱：「師生之義，至希大而極，不待今日有此言。」²⁵楊廷和起用喬宇，宇至鎮江時，尚與一清詩文唱和。²⁶當議禮之時，喬宇從楊廷和之議，而楊一清親自致書，托以肺腑，勸其改變立場。楊一清被張璁等人攻訐身死後，喬宇冒險親往弔唁，師徒之情，可見一斑。「從學者日眾。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為冢宰，皆執弟子禮，終身不衰。公薨，喬復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²⁷故而，喬宇是沒有理由在大規模起用

²⁰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一清傳〉，頁436。

²¹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五〇〈大禮議〉，頁739。

²² 《國朝獻徵錄》，卷一五〈內閣四〉，頁528。

²³ 《明史》，卷一九四〈喬宇傳〉，頁5134。

²⁴ 《石淙詩稿》，卷一五〈歸田後類〉，頁531。

²⁵ 同上注，卷九〈自訟類·東喬希大少卿〉，頁464。

²⁶ 同上注，卷一五〈歸田後類〉，頁531。

²⁷ 李元陽：〈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文襄楊公墓表〉，載《國朝獻徵錄》，卷一五〈內閣四〉，頁525。

正德舊臣的同時，「凡為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²⁸而反對恩師還朝的。

那便只有一種可能：當時實際主政的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堅決反對。武宗暴斃後，楊廷和得到張太后的支持，迅速清理了豹房羣體勢力，並一舉清除與豹房羣體交結的官僚集團，組建了完全以東宮舊僚為成員的內閣，並撤換六部、都察院長官，徹底改變了正德朝的政治格局，建立起巨大的政治權威，完全控制著當時朝廷的政治運作。

楊一清不獲起用原因分析

楊廷和在主政之初，應該即沒有打算起用楊一清的念頭，故致書林俊，卻未顧念楊一清。那麼，楊廷和為何反對起用楊一清呢？這主要源於正德朝二楊的仕路分途。楊廷和的科舉之路十分順利，年十二即舉於鄉。成化十四年(1378)，廷和十九歲時，便得中進士，且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期滿後獲授翰林院檢討一職。²⁹由於翰林官在明代被視為「儲相」，楊廷和在入仕之初即廁身文學侍臣之列，踏上了通往內閣的捷徑，事實也是如此。幾年後，楊廷和由於身為翰林官員的緣故，獲得了仕途生涯中的第一次政治機遇，充任朱厚照東宮講讀官員。

弘治十一年〔1498〕二月，大學士徐溥等以皇太子將出閣講學，請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程敏政，侍讀學士楊守陞，左春坊諭德李旻，司經局洗馬梁儲充侍班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李傑，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焦芳，侍讀學士兼左諭德王鏊，右諭德王華，洗馬楊傑，侍讀劉機、江瀾、白鉞，侍讀武衛；左中允楊廷和，右中允張天瑞，左贊善費宏充講讀官，編修兼較書吳儼、靳貴，禮部員外郎兼正字周文通，大理寺右寺副兼正字劉燾，俱更直供事。又請改敏政為詹事兼學士，陞鏊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上俱從之。仍命溥及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提調各官講讀。³⁰

東宮講讀在明代並不局限於單純的皇室教育，還有與未來皇帝形成私人關係的意味。成化(1465–1487)以後，在內閣的主持下，東宮講讀完全由翰林官擔任。「按詹事府多由他官兼掌。天順〔1457–1464〕以前，或尚書、侍郎、都御史，成化以後，率以禮部尚書、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其協理者無常員」。³¹充任東宮講讀官員成

²⁸ 《明史》，卷一九四〈喬宇傳〉，頁5132。

²⁹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廷和傳〉，頁423。

³⁰ 俞汝楫(編)：《禮部志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七〈選宮僚〉，頁139–40。

³¹ 《明史》，卷七三〈職官志二·詹事府〉，頁1785。

為明中後期翰林官入閣的第一個階梯。楊廷和能夠獲此機會，反映出當時閣臣有意栽培他成為未來的內閣接班人。楊廷和便稱自己入閣只是按照宮僚入閣的慣例來進行的。「宮僚入閣，自是舊例」。³²

明中後期翰林官入閣的第二個階梯是經筵日講。由於明中後期皇帝多數疏於朝政，官員與皇帝直接接觸的機會便主要局限在經筵日講方面，經筵日講成為官員與皇帝形成私人關係的重要場合。而從正統年間(1436-1449)經筵初開之時，經筵日講講官在三楊的安排下，幾乎皆為翰林官，經筵日講也從而成為翰林官入閣的階梯。³³「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旨付弘文館。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次經筵」。³⁴但此後六部既再無重臣撐腰，亦無強力人物為其主持，六部遂再無官員進入經筵日講序列，經筵日講遂為內閣所控制。「凡經筵，欽命內閣大學士知經筵事，或同知經筵事，班俱在尚書、都御史上。講書、展書等官及日講官，俱從內閣於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內，具名題請」。³⁵而楊廷和也獲得了第二次政治機遇，與部份東宮舊僚一同獲得了繼續充任經筵日講講官的職務。

正德元年〔1506〕，開經筵，賜宴及白金綵幣有差。知經筵事者，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同知經筵事者，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兼經筵官禮部右侍郎王華，少詹事兼學士劉機、江瀾、楊廷和，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楊時暢，國子監祭酒張燦，學士劉忠、白鉞、劉春。太常少卿兼侍讀費宏，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毛澄，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毛紀、傅珪，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蔣冕，侍讀羅玘，修撰石瑤也。³⁶

明中期翰林官入閣的第三個階梯是入東閣，典誥敕。正德二年(1507)，楊廷和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敕。嘉靖年間張璁(1475-1539)的奏疏也反映了弘治(1488-1505)至嘉靖年間的多數時間內，知制誥學士實際上僅僅掛銜充位、養成人望，為正式入閣做準備而已。

³² 楊廷和：《楊文忠三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辭謝錄四〉，頁881。

³³ 正統朝閣臣除張益外，其他皆為經筵日講講官。

³⁴ 陸鈺：《病逸漫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白霍山房鈔本(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174。

³⁵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內府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二二一〈翰林院〉，頁618。

³⁶ 黃佐：《翰林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經筵恩賚〉，頁966。

璫奏：「按《會典》，凡內閣所掌文官誥勅，正統間以學士專官，後久不設。弘治七年〔1494〕，復設。如石瑄以吏部尚書兼學士，管誥勅。賈詠以吏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俱得挨次入閣。所以求此官者多。近因吳一鵬不用內閣，人心稍疑，而溫仁和又求為之。仁和歸省，又有求為之者矣。臣謂此實內閣私人，況誥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幸進。聖諭欲革去此官，誠為至重。」遂罷不設。³⁷

可見，楊廷和憑藉正統以來內閣所設定的翰林官歷經東宮講讀、經筵日講、入東閣的慣例傳統，平流進取，已經做好了入閣前的準備。

正德朝除東宮舊僚外，尚有另一政治集團與武宗同樣結成了密切的私人關係，在中樞政治中權勢比內閣更大，這一政治集團便是陪伴武宗在豹房玩樂的豹房羣體。李洵指出，正德年間，武宗長期居於豹房，恣意玩樂，其身邊的寵臣是宦官、佞倖與邊帥，以及其他非士大夫羣體。這些政治勢力進一步掌握了政治決策，形成了「豹房公廨」，可視為「內內閣」與「豹房政治」。³⁸ 本文將這一勢力稱為「豹房羣體」，其領袖為劉瑾（1451–1510）。由於豹房羣體直接與東宮舊僚爭奪武宗的信任，與內閣爭奪中樞政治的權力，以東宮舊僚自居的楊廷和「但私竊自念廷和朝廷春宮舊臣，蒙眷知最久」，³⁹ 便借經筵進講之機，向豹房羣體發難，卻遭到了劉瑾的報復。「當進講而所稱遠佞幸、戒遊逸，失中貴人。瑾指傳改南京吏部左侍郎」。⁴⁰ 但楊廷和很快便還朝，並得以入閣。事實上，廷和之被貶謫，並非出於武宗本意。很快，武宗發現身旁缺少了自東宮時便為之授書的恩師。「八月二十八日，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為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敕，取公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⁴¹ 楊廷和自南官入閣甚至開了一個先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⁴² 楊廷和之得以迅速回朝，在於武宗甚為眷顧東宮舊僚。這從所頒佈的命楊廷和入閣的詔書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正德二年十月某日，奉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素著，特茲召用。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著在內閣同李東陽每辦事，不必再辭。吏部知道。』」⁴³ 當

³⁷ 徐學聚：《國朝典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叢書》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卷六九〈吏部三十六·中書科·附誥敕〉，頁4164。

³⁸ 李洵：《正德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四章，頁70–94。

³⁹ 《楊文忠三錄》，卷三〈視草餘錄〉，頁808。

⁴⁰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廷和傳〉，頁424。

⁴¹ 孫志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忠楊公廷和行狀〉，《國朝獻徵錄》，卷一五〈內閣四〉，頁487。

⁴²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三〈劉瑾用事〉，頁639。

⁴³ 《楊文忠三錄》，卷五〈辭謝錄一〉，頁844。

時劉瑾打擊東宮講讀、經筵日講講官，並非只是楊廷和一人，僅以正德朝入閣之東宮舊僚而言，如梁儲(1453–1527)、費宏(1468–1535)、靳貴(1478–1520)、毛紀(1482–1545)，皆曾受到劉瑾打擊。⁴⁴ 梁儲所受打擊最大，其他皆無大礙。其中原由，可能在於僅梁儲一人未任經筵日講講官，與武宗關係已經疏遠。正德朝東宮舊僚儘管亦遭到豹房羣體打擊，但仍然憑藉慣例傳統，保持了內閣這一勢力範圍，並與豹房羣體保持一定距離的現實，反映出正德朝存在東宮舊僚這樣一個內部成份相同，得到皇帝私人眷顧與制度保障，故而能夠與豹房羣體形成政治對立的政治集團。接受了這次教訓，楊廷和此後韜光養晦，得以無事。

楊一清同樣遭受過劉瑾的打擊。楊一清中進士之後，仕途之路與楊廷和方向完全不同，這種不同道路的起點是楊一清僅考中三甲九十五名，⁴⁵ 未能選入翰林院，初授之官為中書舍人。⁴⁶ 明代中書舍人儘管與翰林官同被視為近侍之官，但中書舍人成為職掌朝儀、書寫文書的輕微小官，與唐、宋中書舍人職權已大為不同，與以儲相自命的翰林官相差甚遠。⁴⁷ 於是，與楊廷和以文學侍臣的身份，依託翰林官平流入閣的強勢傳統不同的是，楊一清不斷在內外官之間遷轉。中書舍人任滿後，先後任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山西，後入為太常寺少卿，遷為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1502)，以左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後陞至陝西三邊總制，負責西北軍事要務。由此，楊一清經歷了由內而外，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外的仕途歷程，先後職掌學政、禮儀與軍事，經歷十分複雜，形成了精幹的政治性格。「一清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略」。⁴⁸ 但由於得罪了劉瑾。「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⁴⁹ 與得到武宗眷顧的楊廷和不同，楊一清由於與武宗無私交，故而只能長期居家。

⁴⁴ 江汝璧：〈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憲費公宏行狀國朝獻徵錄〉，載《國朝獻徵錄》，卷一五〈內閣四〉，頁513；黃佐：〈梁文康公傳〉，載同卷，頁510；王鏊：〈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文僖靳公貴墓誌銘〉，載同卷，頁519；嚴嵩：〈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毛公紀神道碑〉，載同卷，頁530。

⁴⁵ 《楊一清評傳》，頁24。

⁴⁶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楊公一清行狀〉，載《國朝獻徵錄》，卷一五〈內閣四〉，頁520。

⁴⁷ 關於明代中書舍人，參見拙文〈明代中書舍人考論——金、元傳統視野下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6集(2009年)，頁369–431。

⁴⁸ 《明史》，卷一九八〈楊一清傳〉，頁5225。安寧流傳這樣一個傳說：李東陽與楊一清幼時，皇帝用麻繩測試二人才幹。李東陽主張理順亂麻，楊一清卻主張快刀斬亂麻，皇帝稱贊一清可以保國衛民。參見李可(口述)、李亞平(記錄整理)：〈對聯與斬麻〉，原載《安寧民間故事》，轉引自《楊一清評傳》附錄，頁279。這個故事反映出楊一清的精幹之才在民間留下了深刻印象。

⁴⁹ 《明史》，卷一九八〈楊一清傳〉，頁5227。

安化王朱寘鐸(?-1510)叛亂在給一直韜光養晦的楊廷和舒展胸中塊壘機會的同時，更是給予了楊一清重展宏圖的政治機遇。楊一清被起用，與宦官張永一起負責平滅叛亂。儘管同屬豹房羣體，但由於劉瑾做事囂張的緣故，張永與其關係甚為緊張。⁵⁰楊一清在協助張永平叛的過程中，一方面努力結交張永，對其多番讚譽，⁵¹另一方面利用張、劉二人之間的矛盾，與張永一起設計除掉劉瑾，而自己也得張永之助，擺脫了之前的仕途困境，得官戶部尚書，很快又改為吏部尚書，平步青雲，向著仕途的巔峰邁進。

楊一清對豹房羣體從不朋附到交結，這一政治立場的轉變，反映他與楊廷和一樣，都從劉瑾之事中吸取了教訓，只不過楊廷和秉持韜光養晦的態度，倚仗皇帝眷顧與制度保障，可保無事；而楊一清若欲保身進取，只能向前再走一步，與豹房羣體合作，成為當時「交結接豹房羣體士大夫集團」中的一員。正德朝交結豹房羣體士大夫集團的形成是成化以來非翰林官出身、追求事功的事功能臣交結非士大夫勢力（主要是宦官）現象的集中體現。成化至正德朝，宦官勢力強大，官員交結宦官以謀陞遷成為慣常的現象，其中尤以並未得到皇帝眷顧與制度保障的具有政治野心的非翰林官事功能臣與宦官的交往最值得注意。事功能臣往往因此而得以施展政治才華，建功立業，在明中期政治與軍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多由此一羣體完成，但其立身行世，卻由於違反了士大夫政治的原則，多為輿論所非議，王越、王瓊與楊一清皆是如此。明中期非翰林官出身的事功能臣交結非士大夫勢力，建立事功，致位顯赫的道路，與文學侍臣翰林官憑藉皇帝眷顧與制度傳統、平流入閣的道路，形成了兩種並存的現象，兩大官僚羣體間相應也存在不小的矛盾，文學侍臣批評事功能臣交結非士大夫勢力，而事功能臣卻指責文學侍臣的特權，如王瓊稱：「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屬不得齊驅並駕矣。」⁵²文學侍臣與事功能臣的矛盾通過楊一清入閣之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正當楊一清風頭正勁時，兩推內閣不入使他再次陷入了仕途的困境。「正德六年〔1511〕，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楊一清首推內閣，不點，加少保、太子太保，仍蔭子

⁵⁰ 同上注，卷三一四〈宦官傳一·張永傳〉，頁7792。

⁵¹ 《國史唯疑》，卷五〈正德〉，頁127。

⁵² 王瓊：《雙溪雜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51-52。明代士大夫交結宦官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不同階段又有不同的特點。相對而言，明中期事功能臣與宦官的關係主要是相互合作、互相利用，士大夫仍然堅持道德操守，並未完全投靠宦官。冷東撰文區分了明代士大夫與宦官的三種關係：中庸勢力、理想主義者、極端實用主義者，並未將明中期交結宦官的士大夫列入極端實用主義者，便是一個佐證。見冷東：〈明代政治家與宦官關係論略〉，《廣東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頁60-66。

錦衣衛世襲千戶」。⁵³改用成化二十三年(1487)始中進士的禮部尚書費宏。此後，再次廷推楊一清為閣臣。「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以推內閣，不用，用一清之門人尚書靳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⁵⁴再推楊一清的時間，《嘉靖以來首輔傳》未加記載，但《明史》載靳貴入閣的時間為正德九年(1514)二月。⁵⁵可以推測，再推楊一清入閣的時間應在正德八年(1513)末九年初。

楊一清兩推不入內閣，乃受阻於成化以後閣臣由翰林官入閣的傳統。正德前期，由於劉瑾勢大，內閣職位又有空缺，官員交結劉瑾，便可入閣，但除此之外，其他入閣者皆為東宮舊僚。正德後期，豹房羣體勢力已有所衰落，內閣完全由東宮舊僚控制。鑑於楊一清入閣不僅會衝擊東宮舊僚入閣的傳統，而且會使豹房羣體勢力進入內閣這一東宮舊僚的勢力範圍，作為內閣首輔的楊廷和遂堅決維護成化以來東宮舊僚入閣的傳統，反對楊一清入閣。

正德十年(1515)，楊廷和丁憂回籍。楊一清藉機在另一位豹房羣體成員錢寧以及張永的幫助下，進入內閣。「義子錢寧故善一清，而中貴人永為之主，一清得拜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⁵⁶楊廷和離去後楊一清便得以入閣的原因，應在於替代楊廷和為首輔的梁儲，處於東宮舊僚集團的邊緣，且屢受這一集團的打擊，從而與豹房羣體交往，已屬交結豹房羣體士大夫集團。

梁儲雖然亦是東宮舊僚、文學侍臣，但卻與楊廷和諸人在東宮職責、仕途經歷與政治資歷這幾方面都不同，從而逐漸由這一政治集團中分化了出來。正嘉之際內閣五人中，楊廷和、費宏、毛紀皆充任東宮講讀官，蔣冕「侍太子」，未明確其具體職任，而只有梁儲是「侍班官」。⁵⁷侍班官與講讀官的區別在於侍班官並不負責具體的講讀事宜，故而與太子的關係便不如講讀官親近。五人之中，僅梁儲一人未充任武宗經筵日講講官，這表明武宗即位後，梁儲與武宗的關係相對於其他四人較為疏遠。梁儲不僅年歲最長，而且遠較其他四人踏上仕途為早，在其他四人尚為普通翰林官時，梁儲已充孝宗(朱佑樞，1487-1505在位)經筵日講講官，資歷與其他四人大為迥異。故而，梁儲在東宮舊僚中，顯得有些與眾不同。而梁儲又受到劉瑾的打擊，長期居於南京，與武宗、東宮舊僚關係於是更為疏遠。⁵⁸當楊廷和回朝之時，梁儲甘願讓位於後生，可見他在朝中地位並不牢固。這種不穩固的政治地位與梁儲受

⁵³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卷九〈異典述四·與推陞加秩〉，頁418。

⁵⁴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一清傳〉，頁435。

⁵⁵ 《明史》，卷一六〈武宗紀〉，頁206。

⁵⁶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一清傳〉，頁435。

⁵⁷ 《明史》，卷一八一〈劉忠傳〉，頁4827-28；卷一九〇〈梁儲傳〉，頁5040；〈蔣冕傳〉，頁5043；〈毛紀傳〉，頁5045-46。

⁵⁸ 黃佐：〈梁文康公傳〉，載《國朝獻徵錄》，卷一五〈內閣四〉，頁510。

到楊廷和的排擠也有關係。孝宗在陞授東宮官時，楊廷和所獲之官最為顯赫，為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該官雖不是詹事府中地位最高之官員，但卻為閣臣兼官，頗為特殊；⁵⁹而其職責更為關鍵，總領東宮講讀事宜。⁶⁰故而黃佐稱「左右春坊大學士綜勸學輔德、文翰記注之事。」⁶¹正因為此，楊廷和獲得了武宗東宮舊僚集團的領導地位。梁儲資歷既老，又與其他東宮舊僚關係疏遠，為楊廷和所忌與排擠，亦在情理之中了。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梁儲心情十分抑怨。當時內閣既為楊廷和一系所把持，梁儲遂轉而交結豹房羣體，從東宮舊僚集團中分化了出來。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梁儲與豹房羣體交結，但通過間接的史料，大體可以作出接近事實的判斷。張九敘以「結附權奸」的罪名彈劾梁儲，⁶²這一罪名在力攻楊廷和的桂萼(1478-1531)那裏仍然得到確認。⁶³楊廷和對梁儲的排擠在正嘉之際展露無遺。武宗暴斃後，楊廷和策劃政變，對於此事，梁儲竟未能參與。⁶⁴個中原因，據王世貞記載，是由於梁儲與江彬交好，恐其洩漏消息的緣故。⁶⁵而楊廷和本人的記載卻是梁儲與司禮監太監交往較密，又頗與其他豹房羣體成員立場一致，故加排斥。⁶⁶無論如何，時人對梁儲交結豹房群體是持肯定態度的。

在起草遺詔與迎立新主之事上，梁儲也受到了排擠。「予〔楊廷和〕私念厚齋不得去，在此必多齟齬，遂告魏請梁代蔣去。魏云：『隨先生。』厚齋乃喜行。後百凡議擬，予與蔣、毛二公惟善是主，無所乖戾，要之天意所在，非偶然也」。⁶⁷梁儲因此在正嘉之際喪失主動權。⁶⁸對於楊廷和專權之事，梁儲未嘗無怨意。楊廷和在梁儲走後，即全面安排京城事宜。梁儲遂以此諷於安陸新勢力。「已上事俱以先帝末命行之。厚齋在安陸聞之，言於藩府臣僚曰：『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耶？』」⁶⁹黃佐又指出梁儲正嘉之際「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既而屢疏乞骸，情懇切，上留之至

⁵⁹ 孫志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忠楊公廷和行狀〉，載《國朝獻徵錄》，卷一五〈內閣四〉，頁486。

⁶⁰ 《明史》，卷七三〈職官志二·詹事府〉，頁1784。

⁶¹ 《翰林記》，卷一〈左右春坊〉，頁863。

⁶² 張居正等：《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一，「正德十八年六月己酉」條，頁50-51。

⁶³ 《明史》，卷一九〇〈梁儲傳〉，頁5042-43。

⁶⁴ 《楊文忠三錄》，卷八〈辭謝錄四〉，頁883。

⁶⁵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廷和傳〉，頁426。

⁶⁶ 《楊文忠三錄》，卷三〈視草餘錄〉，頁808，814。

⁶⁷ 同上注，卷四〈視草餘錄〉，頁820-21。

⁶⁸ 同上注，頁821-22。

⁶⁹ 同上注，頁822。

再，乃可其奏」。⁷⁰綜上所述，梁儲與東宮舊僚集團，尤其楊廷和存在矛盾，並藉攀援豹房羣體以維護自己，應實有其事。

正嘉之際，武宗去世後，豹房羣體驟然失去權力來源，與之交結的士大夫集團也相應失勢。東宮舊僚控制的內閣卻因在正德朝與豹房羣體保持距離，在朝廷清議中處於有利地位，從而祭出土大夫政治的口號，以維護自身政治地位，清洗豹房羣體及所屬士大夫集團。⁷¹同時，楊廷和起用東宮舊僚費宏進入內閣，替代了與他相左的梁儲，⁷²從而組建了完全聽命於楊廷和的內閣。不僅如此，楊廷和還將內閣勢力進一步擴展至中央機構，除禮部仍由東宮舊僚毛澄（1460–1523）控制外，其他五部與都察院皆進行了大輪換。吏部尚書最初為石瑄（1466–1529），後改為喬宇；戶部尚書為孫交；兵部尚書為彭澤（1459–1530）；工部尚書初為林俊，後改任刑部尚書；工部尚書由陶琰擔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由金獻民擔任。以上諸人多曾得罪劉瑾或江彬（？–1521），或身居南職，或致仕在家，或罰米於邊，⁷³大量閒居官員的任用，不知是否是楊廷和借鑑了石瑄之事上的教訓。「世宗立，代王瓊為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瑄剛方，謝請托，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敕」。⁷⁴無論如何，這些人能驟獲重用，至少會對楊廷和懷有感激之情。可見，正嘉之際，楊廷和完全控制了朝廷主要機構的人事關係，建立了東宮舊僚內閣主導下的士大夫政治。嘉靖初年舉朝上下一致追隨楊廷和，抵禦世宗的議禮主張，在人事方面，應根源於此。

在這種政治局勢下，曾與豹房羣體交結的楊一清若欲復出便困難重重了，而當時朝廷拒予起用的理由也應在此。這從正嘉之際胡世寧的奏疏可以看出一些信息：

近日言官奏起舊臣中，有如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其人也。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臣願陛下早致此四人，而用之輔弼，或部臺要地。⁷⁵

所稱「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便應是委婉地指出楊一清與豹房羣體有染。

⁷⁰ 黃佐：〈梁文康公傳〉，頁511。

⁷¹ 《明世宗實錄》，卷一，「正德十八年六月己酉」條，頁50–51。

⁷² 《明史》，卷一九四〈費宏傳〉，頁5108。

⁷³ 參見以上各人《明史》本傳。

⁷⁴ 《明史》，卷一九〇〈石瑄傳〉，頁5048。

⁷⁵ 胡世寧：〈胡端敏奏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畧陳治要以獻愚忠疏〉，頁591。按胡世寧於正德時因言寧王不法事而得罪，賴楊一清告錢寧，始得減戍。此時胡世寧上疏為楊一清張目，當亦有此關係在。見《明史》，卷一九九〈胡世寧傳〉，頁5260。

嘉靖初年楊一清在野議禮及重獲起用

楊一清一再被楊廷和拒絕起用，其失望與不滿的心情可想而知。而此時爆發的「大禮議」給了楊一清機遇。由於以楊廷和為代表的在朝正德舊臣幾乎全部反對世宗的禮儀主張，而世宗除了幾名小官之外，再無大臣支持，非常孤立。在這種情況下，楊一清決定參與議禮，以達到獲得世宗的了解、再次復出的目的。不過楊一清如果直接支持世宗，一定會冒犯天下清議，失去積累多年的政治威望與人事關係。有鑑於此，他採取了間接的方式支援世宗。⁷⁶

楊一清參與議禮的時間值得玩味。正德十六年，「大禮議」已經開始。當年七月，張璁即上《大禮或問》疏，參與議禮。儘管楊一清後來在《明倫大典·後序》中回憶稱：「初，臣一清臥病江南，聞廷議，驚曰：『奚至是哉！』及見臣璁所著《或問》，喜曰：『天地間自有公是，不可易也。』既而嘩者未息。」⁷⁷並將這一看法告訴喬宇。「時大禮議起，張璁疏欲考興獻王，而母獻王妃。一清心知所謂，以書予其門人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言，聖人復起不易矣！』」⁷⁸但他將這一看法傳達給喬宇的時間卻是在嘉靖三年(1524)四月，此時楊廷和已經致仕兩月，「大禮議」走向已基本明瞭。

因憶先是四月、六月，各寄書云：「人臣進言，當體太《易》納約自牖之訓，無世俗徇之見；以伉直為賢，恐激衣冠之禍。」此書未達而衣冠之禍果成，白崖亦且西歸，不及見矣。主上仁孝寬裕，可與致太平；臣下不能從容開導，以成就君德。顧乃專務攻訐，期於必勝，遂釀成厲階，不知何所止極，豈非天哉！⁷⁹

楊一清的這段言論對於「大禮議」確實產生了影響，不然張璁不會把他此番言語收入《明倫大典》中。⁸⁰雖然楊一清於嘉靖四年(1525)在給喬宇的信中，指出喬宇在嘉靖三年未及看到其四月所寫書信，便已致仕。其實喬宇是在嘉靖三年七月致仕的。⁸¹

⁷⁶ 楊一清珍惜自己在正德舊臣中聲望的心理，可以通過他對楊廷和陣營中人物亦表達安慰與支持，藉此維繫與這一陣營的關係看得出來。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常少卿夏良勝因在議禮中堅決反對世宗的主張，而被謫任湖廣茶陵知州，楊一清與其唱和詩文，有詩云：「議禮年來聚訟頻，力持國是屬吾人。聖皇不為求循吏，遠郡安能屈近臣。世上令名完有几？古來公論定方真。亦知州牧非謙客，把酒臨歧莫愴情。」見《安甯楊文襄公集·詩集·夏少卿於謫守茶陵道鎮江謁予邃菴賦贈》。

⁷⁷ 《楊一清集》，附錄一〈明倫大典後序〉，頁1116。

⁷⁸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一清傳〉，頁436。

⁷⁹ 《楊一清集·督撫稿·柬札類·與致仕喬白崖太宰》，頁1078。

⁸⁰ 《楊一清集·密諭錄》，卷六〈政諭中·乞休致仕疏〉，頁1020。

⁸¹ 《明史》，卷一一二〈七卿年表二〉，頁3450。

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四月的信應該能在七月之前送達，故而喬宇應該看到了四月信。這從世宗與楊一清的一番對白可以看出：「乃當時世宗聖製一篇，其略云：『今世衰道微，人欲熾盛。彼之附和者，師生兄弟亦有不同。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楊一清代為桂辨云：『喬宇不聽臣言，若水被獻夫，誠然！若桂華能持正論，未可盡非。』⁸²

楊一清之所以稱喬宇未看到此信，應是不便明說喬宇不聽其言，以免雙方尷尬。後來楊一清又曾針對席書(1461–1527)《大禮考議》發過議論。「比見臣書《考議》之出，曰：『是安得復有異議乎？』」⁸³《大禮考議》在嘉靖三年正月始上達朝廷，⁸⁴則楊一清此一議論即使曾對外人言及，也已甚晚。《大禮考議》上達朝廷之後，世宗非常重視，召見席書。但此時朝中官員對席書十分痛恨，席書對是否應詔赴京，心有疑慮。楊一清「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⁸⁵可見楊一清雖參與議禮，但卻選擇了「大禮議」走向已經趨於明朗的時機，具有一定的投機性質。對於此，沈德符(1578–1642)評論說：「楊丹徒迎合意旨，亦矯喬、湛以傳會時趨，寧非勢利之尤乎？」⁸⁶

另一方面，不能以楊一清議禮行為有投機心理，便以其議禮主張毫不足取。在致喬宇四月信中，楊一清表達的不應與世宗過分相抗、否則容易激發衣冠之禍的觀點，一語揭示了「大禮議」所隱藏的巨大政治危機。當時議禮雙方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身在其中，不能自拔，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反而能冷靜審視這一事件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影響。同是閒居於家的王陽明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其致霍韜書稱：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疾，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眾，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於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⁸⁷

⁸²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二五〈評論·評議大禮諸臣〉，頁628。

⁸³ 《楊一清集》，附錄一〈明倫大典後序〉，頁1116。

⁸⁴ 《明史》，卷一九七〈席書傳〉，頁5203。

⁸⁵ 同上注，卷一九八〈楊一清傳〉，頁5230。

⁸⁶ 《萬曆野獲編》，卷二五〈評論·評議大禮諸臣〉，頁628。

⁸⁷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二一〈外集三·與霍兀崖宮端丁亥〉，頁834。

楊一清參與議禮終於獲得了回報。「璫等既驟顯，頗引一清」。⁸⁸「時執政者費宏、石瑄、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⁸⁹楊一清遂得以再次復出。但這次楊一清並未以原職起用，而是降低許多，僅以陝西三邊總制的身份起用行邊。世宗君臣如此安排，應該出於謹慎的考慮，即起用四朝舊臣楊一清，雖然有利於收攏人望，但楊一清名高望重，精明靈活，議禮方式也屬間接，並未公開與直接地站在世宗一邊，能否為新朝所用，尚待檢驗，故而不便徑直召入內閣、主持政務，以免節外生枝。降低其規格，既可挫其鋒芒，又便於控制。對於楊一清來講，這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折辱。但一心復出的楊一清，不顧已過古稀的高齡，⁹⁰再次趕赴西北。當其路過洛陽，拜謁致仕閣臣劉健時，卻被劉健指責有辱「內閣體統」。⁹¹

楊一清再入閣與王陽明對嘉靖初年政局的分析

世宗君臣此種做法確實達到了目的。楊一清既以起用而成正德舊臣之敵，其從三邊召回便需世宗力排眾議，一去一回之間，新朝既對楊一清顯示了恩德，而楊一清也只能越發向朝廷靠近。

今陛下采諸輿論，斷自宸衷，慨然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瑄，舉朝欣躍，方謂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羣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⁹²

楊一清再次入閣之前，心有徘徊，曾致書於王陽明，詢問進退機宜。楊一清與王陽明交往頗深，在楊為吏部尚書時，「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啟處必共之」。⁹³當時王陽明

⁸⁸ 《明史》，卷一九八〈楊一清傳〉，頁5230。

⁸⁹ 同上注，卷一九七〈席書傳〉，頁5205。

⁹⁰ 《楊一清集·督撫稿·東札類·與致仕喬白崖太宰》，頁1078。楊一清為人積極進取，雖屢遭挫折，但仍執著仕途。對此，他自己也頗有感慨：「北風吹土黯衣裳，久客懷歸意渺茫。六十年來三致仕，四千里外七還鄉（予自中書謁告南歸，歷官中外，至是凡七歸鎮江云）。君臣義重真難報，天地恩深敢忘。遙想家園籬下菊，清香不改舊時黃。」見《安甯楊文襄公集·詩集·致仕出城途次口占》。

⁹¹ 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四〈侃直〉，頁122。《國朝獻徵錄》與《嘉靖以來首輔傳》有著相似的記載。見《國朝獻徵錄》，卷一五，頁528；《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楊一清傳〉，頁436。

⁹² 《胡端敏奏議》，卷五〈計開講義三章〉，頁641。

⁹³ 《王陽明全集》，卷三三〈年譜一〉，頁1235。

所陞僅為南京刑部主事，而楊一清轉授之為吏部驗封主事，職務要重要得多。⁹⁴王陽明父王華(1446-1522)墓誌銘由楊一清所撰，⁹⁵楊一清文集也由王陽明著序。⁹⁶楊之於王，幫助甚多，⁹⁷其中尤以王平滅朱宸濠叛亂後，為豹房羣體所忌，幸得楊一清、張永解救，始得免禍最為緊要。⁹⁸

楊、王二人交情既深厚，王陽明遂直言不諱，指出嘉靖初年政局甚為險惡。「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即正德舊臣與議禮新貴之矛盾尚未消釋，楊一清此時入閣，勢必牽連甚深，將會始終處於政爭中心而不得避，很容易禍及自身。但由於楊一清已被起用，並且牽連到「大禮議」中去，此時身退，為時已晚。楊一清本人又是一汲汲進取之人，不會主動求退。故王陽明稱：「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那麼，楊一清實處於進退兩難的危險境地。「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但王陽明卻於此絕境中為楊一清指出可以沖出圍困、解決問題的方案：「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即讓楊一清努力控制朝政大權，從而獲得全盤解決所有問題的主動權。但權力之獲得實為政治中最難之事，楊一清欲掌嘉靖政局主動權，並非易事。王陽明分析了掌握權力的可能：「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眾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眾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即由於「大禮議」引發的正德舊臣與議禮新貴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尚未解決，一系列的政治鬥爭才剛剛開始，楊一清可以利用自身崇高的威望與豐富的人脈，居中調解，化解衝突，整合官僚羣體，促使嘉靖初年政局走向平穩。

王陽明的這一分析頗洞悉嘉靖初年政局之特點。世宗起初確實對楊一清十分重用，但王陽明卻高估了楊一清對於正德舊部的號召力。楊一清既以傾向世宗君臣而召用，遂與正德舊臣關係疏遠。另外，王陽明對於議禮新貴的權力欲望與自保心理，尤其世宗加強皇權的意識的估計都有些偏低，而恰恰是這些因素，導致楊一清最終失敗。

無論如何，在王陽明看來，楊一清不能隨波逐流而喪失主動。「苟亦從而委靡，固淪胥以溺矣」。言語之間，王陽明甚至透露出了一些悲壯的意味：「故任禍者，惟

⁹⁴ 王世貞：《弇州續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六〈文部·史傳·王守仁〉，頁254。

⁹⁵ 楊一清：〈海日先生墓誌銘〉，載《王陽明全集》，卷三六〈世德紀〉，頁1385-91。

⁹⁶ 《楊一清集·督撫稿·柬札類·與王陽明司馬》，頁1069。

⁹⁷ 《王陽明全集》，卷二七〈續編二·與楊邃庵〉，頁1013-14。

⁹⁸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頁5164-65；《王陽明全集》，卷三四〈年譜二〉，頁1269。

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故而，王陽明對於楊一清入閣的最終定位是以一己承擔天下之禍。⁹⁹

楊一清與嘉靖初年明朝政局

楊一清既急於進取，遂再次入閣，從此便深陷嘉靖初年政治紛爭之中。當楊一清入閣之初，世宗君臣出於排擠費宏的緣故，對其頗為藉援。費宏在「大禮議」中左搖右擺，在「大禮議」後，仍得留任，¹⁰⁰但卻逐漸遭到謀求陞遷的張璁等人的排擠。¹⁰¹隨著費宏離去，楊一清位居首輔，主持朝廷大政，議禮新貴與楊一清的矛盾遂逐漸顯露出來，雙方主要分歧點在於楊一清反對世宗君臣清洗正德舊臣。如嘉靖五年（1526）請求寬貸議禮獲罪官員。¹⁰²六年（1527）反對出翰林官與外及科道官互糾，以保全翰林官與科道官。七年（1528）利用主持修纂《明倫大典》的機會，縮小朝廷打擊的官員範圍。八年（1529），以「惜人才」為名，反對桂萼利用朝覲考察，大規模罷免官員。¹⁰³胡吉勛對此進行了研究，¹⁰⁴此處不贅。

楊一清這一政治立場，相應會引起世宗君臣的不滿。雖然楊一清也努力改善與議禮新貴的關係，比如請求世宗授張璁、桂萼散官職銜，¹⁰⁵但他與議禮新貴在人事關係與政治立場上的根本矛盾卻無法消除。

璁與桂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己，一清願請召謝遷，心怨之。遷未至，璁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黨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訐璁，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可。璁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嗾黃綰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璁以能遷故排己，且傍及璁他語。因乞骸骨。帝為兩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璁益憾。桂萼入內閣，亦不相能。¹⁰⁶

雙方在對待正德舊臣的政治立場上更是針鋒相對，無法妥協。

⁹⁹ 《王陽明全集》，卷二一〈外集三·寄楊邃庵閣老·二癸未〉，頁820-21。《安甯楊文襄公集》附錄也收載此信，改題〈寄邃庵閣老論相業書〉。

¹⁰⁰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費宏傳〉，頁432。

¹⁰¹ 同上注，卷一〈楊一清傳〉，頁436。

¹⁰² 《楊一清集·宸翰錄》，卷三〈為應制陳言修省以回天意疏〉，頁806。

¹⁰³ 《楊一清集·閣諭錄》，卷三〈奏對·論弭災急務奏對嘉靖八年正月〉，頁875-77。

¹⁰⁴ 《「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頁484-97，392-93，99-103。

¹⁰⁵ 《楊一清集·密諭錄》，卷五〈政諭上·論崇禮大臣本〉，頁1014。

¹⁰⁶ 《明史》，卷一九八〈楊一清傳〉，頁5230。

公復上辭章謂：「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為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¹⁰⁷

這段話概括了楊一清與議禮新貴的矛盾核心與立場根本差異所在，即議禮新貴主張利用各種機會，將議禮失敗者一網打盡，故在一些政治事件中力主「刻核」，而楊一清卻出於保全正德舊臣的態度，主張「寬平」。

楊一清既與張璉、桂萼關係不睦，由於其他議禮新貴基本皆為王門中人，楊一清若能與之同心一致，也能在當時政治鬥爭中佔據有利地位。事實上，王門議禮新貴與楊一清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王陽明專門致信方獻夫（1486–1544），同樣以行舟作為比喻，讓其與楊一清同舟共濟。

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邃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¹⁰⁸

王門弟子受王陽明影響，亦多從全局的觀點，維護嘉靖初年政局，如方獻夫與霍韜（1487–1540）皆有維護議禮失敗諸臣的舉措。¹⁰⁹

身處政局之中，利益爭奪遂不可避免，楊一清於王門弟子，雖多援引，比如推舉方獻夫出任吏部；¹¹⁰但雙方爭鬥亦多，如黃綰以楊一清阻其仕進，遂加彈劾。¹¹¹世宗在霍韜入閣事上詢問楊一清，楊稱：「霍韜亦英邁之士，但放言無忌，隱行難測，可備纂述之任，而不可居政事之司，諒聖明知之久矣。」¹¹²霍因此而未能入閣，因此之故，亦對楊心懷怨恨。

「大禮議」之後，世宗對議禮新貴的倚重相應有所減弱，議禮新貴內部也開始了爭權奪利，此時正是王陽明所稱楊一清應努力掌握權力之時。楊一清也確實在此時開始實質性的反擊，先是薦舉張永掌團營，繼又親自上疏，表達與張、桂決裂的決

¹⁰⁷ 《石淙楊文襄公傳》，頁1123。

¹⁰⁸ 《王陽明全集》，卷二一〈外集三·答方叔賢·三丁亥〉，頁831。

¹⁰⁹ 《萬曆野獲編》，卷七〈內閣·張方二相〉，頁198，197；同卷，〈內閣·桂見山霍渭崖〉，頁196；《玉堂叢語》，卷三〈薦舉〉，頁98。

¹¹⁰ 《楊一清集·密諭錄》，卷六〈政論中·論方獻夫代任吏部何如奏對〉，頁1035。

¹¹¹ 同上注，〈乞休致奏疏〉，頁1022–23。

¹¹² 同上注，〈論充內閣官奏對〉，頁1043。

心。¹¹³世宗此時也開始厭惡張、桂之「專恣」。¹¹⁴於是，給事中陸粲(1494–1551)等彈劾張璉、桂萼招權納賄、擅用威福。¹¹⁵陸之行為，是否直接受楊一清之命，難於確認，但陸為楊之門生。「公又為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謂厭張、桂。粲思有所論列，未發也。……上於是下諸給事、御史擊勦章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勦，必曲救，令勿聽。公偶泄之縉，縉亦語粲也。」¹¹⁶縉為禮部侍郎徐縉，亦屬一清一派。可見，即使陸粲此次彈劾並非出於楊一清直接授意，但也是楊一清長期影響的結果，又間接得到了楊一清的授意。當陸粲彈章上達後，楊也趁機明確表達了反對張、桂的立場。¹¹⁷張、桂遂去位離京。

按道理來講，隨著張、桂的離去，¹¹⁸楊一清已經獲得勝利，實現了王陽明所稱的掌握權力的階段。王陽明並未估計到世宗君臣在議禮成功後，內部利益雖有分化，但世宗打擊政治反對派、樹立皇權的心態十分強烈，議禮新貴由於冒犯天下清議，缺乏政治安全感，故而對「大禮議」十分敏感，當其羣體利益遭到外部攻擊時，便會立刻團結起來，共同對外。楊一清實無法掌握嘉靖初年權力。世宗最初罷免張、桂，並未聯繫到議禮之事，而只是不滿二人入閣後氣焰囂張，但待議禮新貴尤其霍韜、方獻夫將與楊一清諸臣的矛盾上升至議禮的延續，攻擊楊一清任用私人，方獻夫請求致仕，表達議禮新貴「同為議禮之人」，「同事一體」的立場時，¹¹⁹世宗對「大禮議」的記憶便再次清晰起來，將陸粲與楊一清聯繫起來，視為正德舊臣對議禮新貴圍繞「大禮議」而發動的政治報復，從而重新開始一意維護議禮新貴，楊一清只能再次致仕返鄉。

楊一清既然無法控制嘉靖初年政局，也便無法挽回官僚集團分裂、政治風氣狠戾的狀況，其自身也身任天下之禍。楊一清回鄉後的第二年，張璉等彈劾楊一清受張容錢財為張永撰寫墓誌銘，「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污讟，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¹²⁰楊一清去職後，朝中再無維護大局的主政者，世宗君臣大肆清洗正德舊臣。受此影響，嘉靖朝政局遂呈現官僚集團分

¹¹³ 〈石淙楊文襄公傳〉，頁 1123。

¹¹⁴ 《楊一清集·密諭錄》，卷六〈政諭中·乞休致奏疏〉，頁 1023–24。

¹¹⁵ 《明史》，卷二〇六〈陸粲傳〉，頁 5449–50。

¹¹⁶ 〈石淙楊文襄公傳〉，頁 1123。

¹¹⁷ 同上注，頁 1124。

¹¹⁸ 安寧流傳楊一清「借松戲張璉」的傳說，將楊驅張事件形象化為成楊略施小計，借助松椅，迫使張璉出醜最終出閣的故事。這個傳說反映出民衆對當時政治鬥爭一種通俗化的理解。參見張嘉鰲(口述)、譚祖安(采寫)：〈藉松戲張璉〉，載《楊一清評傳》附錄，頁 272。

¹¹⁹ 〈楊一清與嘉靖新政〉，頁 48–50。

¹²⁰ 《明史》，卷一九八〈楊一清傳〉，頁 5231。

裂、政治風氣狠戾的狀況。嘉靖以後閣臣之間、閣部之間，乃至時人所謂的「黨派」之間的黨同伐異、義氣之爭，未嘗沒有「大禮議」造成的政治格局與風氣的深遠影響。可見，在一定意義上，明後期黨爭之局，實啟於此。

結 論

明代正統以來形成了翰林官通過東宮講讀、經筵日講，與皇帝結成私人關係而入閣的慣例傳統，這在正德朝尤其突出。正德後期，東宮舊僚以文學侍臣的身份，依託皇帝眷顧與制度傳統，較少受到豹房羣體的打擊，並仍然控制了內閣這個傳統勢力範圍，與豹房羣體及所屬士大夫集團形成了政治對立。非翰林官出身的楊一清典型地體現了明中期非翰林官出身的事功能臣為追求事功而靈活權變的政治性格，經歷了豹房羣體的打擊後，轉而通過交結豹房羣體，致位通顯。正嘉之際，楊廷和建立了完全聽命於己的東宮舊僚內閣，並祭出土大夫政治的口號，清洗豹房羣體及所屬士大夫集團，控制了中央機構人事關係，建立起東宮舊僚內閣主導下的士大夫政治，對抗世宗皇權。嘉靖初年之所以出現在朝正德舊臣一致追隨楊廷和、反對世宗議禮主張的局面，人事根源便在於此。楊一清由於交結豹房羣體的緣故，在嘉靖初年不被楊廷和起用，遂在「大禮議」上採取在野間接支援世宗的方式，獲得後者的了解，而得以再次入閣，位居首輔。不過楊一清復出後的立場並非是驅逐正德舊臣，而是竭力調節議禮雙方的矛盾，避免正德舊臣遭到世宗君臣的清洗。楊一清的主張直接與世宗加強皇權的政治意圖相抵觸，其致仕、身死的結果也使嘉靖初年朝中再無維護大局的主政者，嘉靖政局遂陷入官僚集團分裂、政治風氣狠戾的狀況，開明後期黨爭之漸。

後記

本文發表前，胡吉勛博士寄來香港大學謝雋曄2009年2月完成的碩士論文〈楊一清政治生涯研究〉，所用史料與本文相若，但思路與結論均不同，讀者可參考這篇有價值的論文，以獲取關於此一問題的其他信息。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Yang Yiqing: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Zhengde Reign Grand Secretariat Officials and Their Shizong Reign Counterparts Involved in the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during the Early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 Summary)

Zhao Xianhai

In the early Jiajing 嘉靖 period (1521–1566)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Grand Secretariat was dominated by Emperor Zhengde’s 正德 (r. 1506–1521) court lecturers, and Yang Tinghe 楊廷和 (1459–1529) was the Chief Grand Secretary. The Grand Secretariat controll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reaucracy and dominated the tenor of scholar-officials’ politics. As a result, the Zhengde *Baofang* 豹房 political group and a few scholar-officials associated with it were expelled from the cour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rebuffed Emperor Jiajing in the so-called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Daliyi* 大禮議). Yang Yiqing 楊一清 (1454–1530) made political gains in the Zhengde period through maintaining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Baofang* group. Because of this, Yang Tinghe, the new Grand Secretary, refused to recall him to court. But Yang Yiqing was reinstated by Jiajing because Yang supported the emperor in the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After Yang Yiqing became the Chief Grand Secretary, he tried to mollify the contradictions of both sides fomented in the Great Rite Controversy and objected to banishing the loser. But his stand ran counter to the emperor’s attempt to bolster imperial authority. After Yang’s dismissal, the court was split into two political groups, and factional conflicts among the groups surfaced.

關鍵詞：楊一清 嘉靖初年 在野正德舊臣 大禮議 楊廷和

Keywords: Yang Yiqing, early Jiajing period, Zhengde officials not reappointed in the Jiajing reign,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Daliyi*), Yang Tinghe